

探寻无锡转型 |

# 无锡:探寻“全方位转型”新路向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转型思路

□本报记者 蔡国兆

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转型!这种转型对于无锡而言,或许感到更为紧迫。按常住人口算,无锡人均GDP已超过6300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当年亚洲四小龙腾飞时期的水平,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及时或很好地转型,“拉美现象”很可能会发生在无锡的身上。

## 经济转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记者:对于无锡而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发展道路的转变,怎样的路径是合适的?

杨卫泽:我们认为主要应该做好“加、减、调”三项工作。“加”是致力于科技创新、创业上求突破,这是正向促进的工作;“减”是致力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上求突破,这是反向约束的工作;“调”是致力于调整优化结构上求突破,这是优化提高的工作。

记者:在“加”和“减”的工作上,无锡希望实现怎样的目标,达到怎样的效果?

杨卫泽:无锡要改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状况,走出一条依靠要素生产力提高发展经济的新道路。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创业上的突破,提高无锡的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来发展经济,今后无锡是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高新企业是否能大幅度快速成长;二是是否真正聚集了高层次人才。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通过现有企业的改造提升,使其成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和提高现有企业的科技含量和自主创新能力,“另外一条腿”是吸引科研人员、科研单位到无锡创业、孵化,引进科研成果到无锡转化、产业化,培育一大批科技创业型企业。这将成为无锡发展的主流和特色。

同时,无锡要致力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上求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三大约束性指标——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20%,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和产出强度要提高30%到40%。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约束指标来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使无锡从经济增长速度转到重经济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记者:那么,在调整优化方面,无锡将有什么举措呢?

杨卫泽:调整优化结构涉及的内容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三方面。

一是所有制结构。无锡的经济在改革初期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最近已经转到非公经济为主。目前,无锡的外资占到整个经济的35%左右,民资占55%左右。下一步我们希望外资、民资、国有、集体互相融合,互相参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无锡希望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嫁接,多元融合。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鼓励企业上市。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使三次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和各大产业内部的提升。无锡今后将重点抓硅科技产业、液晶产业和生物工程等为主的先进制造业、软件、动漫、设计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高效农业,希望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上有更大突破,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齐转”和现代农业大发展的格局。

三是城乡优化,无锡过去以农村为主,后来又经历了发展小城镇为主、发展城市为主的阶段。下一步无锡将实现全区域城市化的目标。现在无锡的城市化率达67%,今后要达到90%左右。



硅科技产业,液晶产业和生物工程将是无锡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 资料图

## 社会转型——推开“参与式预算”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无锡在社会转型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吗?

杨卫泽:社会转型有很多方面。我们就其中一点简略谈一下吧。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民众需要更多知情权、参与权,这要求政府进一步推行政务、党务公开,要求政府更多科学民主决策。

不会往区及区以上的行政区划中推开?

杨卫泽:从职能上划分,预算需要人大的批准。之所以在街道一级试点,因为街道没有人大这一机构设置。因而,往上推需要进一步思考。

但在街道的层面推广是没有问题的。

## 政府转型——政府不再做“老板”

记者: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在实践中也需要政府的转型,无锡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思考?

杨卫泽:政府转型这个话题很大,牵涉面也很广。我们认为政府的主要问题在于“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政府部门把行政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集于一身,把资产管理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集于一身。这造成了政府在很多领域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

比如卫生、教育等部门,90%以上的精力在直属医院、直属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府部门怎

么可能真正关心、关注面上的东西。

去年,无锡成立了医院管理中心、学校管理中心、文化艺术管理中心、体育场馆和训练管理中心等四个管理中心,将原先分属卫生局、教育局、文化局、体育局的直属单位剥离出来。无锡的这一“管办分离”试点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举措。管理中心成立后,文卫体教等政府部门不再管理所属资产,成为纯粹的行政管理部门。

记者:“管办分离”对于政府而言,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卫泽:原来政府的一

些部门角色存在着混乱现象,“管办分离”理清了它们的定位。

文卫体教这些政府部门,原来既是“老板”(资产管理职能),又是“公仆”(行政管理职能)。在“老板”和“公仆”这两个角色之间是有冲突的。我们原来一些部门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很多时候被直属单位所左右。

无锡现在搞的“管办分离”实际上继承了成立国资委的思路,让政府部门不再做“老板”。我们现在要求“中心”少点官本位、少点权力意识,“局”多点公仆意识,少点老板意识。

# 任志强为暴利正名露出了什么

□陈军华

房地产界的著名理论家任志强先生一开讲,地球人都笑了。

任志强先生指出,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报告中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仅为6.7%,不管是净资产回报率还是销售利润率都在7%以下,在全国普查的16个行业中销售利润率排在第7位,仅为中游的水平。开发企业受法律的保护,没有必要、也不应公布自己的成本。

到2004年的时候,房价就已经上涨了许多,有些地方的房价甚至已经翻番。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才不到10%,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意味着,在房

价还没有快速上涨以前,房地产界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赔钱的,且赔得血本无归、衣不蔽体。如此说来,人

们应该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房地

产开发商们抱以深切的同情和感激,因为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人民的住房事业作出了巨大奉献。

同时,开发商还作出了巨大牺牲。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10大暴利行业”排行榜,对于房地产业这样一个利润回报率不足10%的行业,这种排名是多大的一个黑锅啊!然而,开发商们一声不响地忍了,背着暴利的黑锅继续从事房地产业开发。直到今

天,任志强先生才突然拿出2004

年的数据对大家说:你看看,我们

的利润率仅为6.7%。然而,有一点公众却并不懂了,正是在这个利润率非常低的时期,房地产界的富翁们却雨后春笋般地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在2004年中国大陆百富榜中,房地产业老板占据了百富榜的45%;在2005年度胡润系列富豪榜中,排名第50的富豪中有24位涉足房地产业;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仍以25.5%的比例排在首位。房地产业成为造就富豪最多的行业,50位房地产富豪的总资产达到2010亿元,平均财富40.2亿元,而上榜门槛高达15亿元,是所有行业榜单里最高的。

这些富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吗?显然不是,是靠暴利催生出来的,这本身就让任志强先生的观点失去了事实基础。据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从事过近10年投资研究工作的李清明估算:2004年,北京全市房地产业一年的利润高达249.8亿元,不到两天就要催生出一个亿万富翁。

既然事实与任志强先生的理论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得出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核定成本,让成本给出正确答案。但这恰恰是任志强先生最反对的。任志强先生在罗列了一大堆法律条文的时候,遗忘了重要的一条,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理由知道房价的大致成本。既然任志强先生坚持房地产业的利润率低得可怜,为何不用成本核定来证明本行业的“清白”?

任志强先生反对公开成本的另一个理由是,决定市场价格的是市场需求关系,不应该人为干涉,而在目前的房地产业,在这个催生富翁的暖房里,有多少非市场因素在影响乃至左右着这个市场?任志强先生的正名,恰恰暴露出房价的成本黑洞,暴利正是在这个黑洞中得以完成。面对一个个粉墨登场的富豪开发商,公众难道没有理由知道黑洞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吗?

# 国家公务员考试热的隐忧

□珑铭

由于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太多,国家公务员报名网站不得不在10月16日下午到夜间暂停运转,进行系统维护。报名人数过多造成系统瘫痪——国家公务员考试再一次展示了它的巨大魅力。绝大多数岗位竞争激烈,个别岗位吸引了几千人竞相争抢。

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行业像国家公务员这样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尽管政府在批评高学历至上用人观时,一向旗帜鲜明,但在自己选人时,动辄打出高学历的标签。就连一些技术要求很低的岗位,也往往要求硕士、甚至博士学

历。

公众的印象来自于现实。不久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据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想想看,13亿人所享受的医疗费用仅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的四分之一,这种“切实利益”还不够具有吸引力吗?

国家公务员是为公众服务的一种群体,其主要任务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建立社会

保障体系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当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的时候,公务员已经率先有了保障。公务员利用公共资源,首先为自己服务,是导致公务员位置吸引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结果尽管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从现代社会的管理理念,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来说,公务员率先为自己谋福利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公务员首先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是一种群体特权的表现,这种群体特权在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会令公众失望,并且,也容易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引导。因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权力持有者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牟利行为进行了严格限

制,比如,美国关于国会议员薪金变动的《第2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从根本上杜绝议员通过公权力率先为自己牟利。

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公务员首先应该努力构筑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惠及民众,然后冉惠及自身。这种顺序不仅可以激励公务员勤奋工作,以大局为重,也能激励公务员与公众同甘共苦,共同实现构建富强、和谐社会的目标。

面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热,我们应该认真深思。

## 干部“观察员”莫成为一场反腐秀

□魏也

腐败的一部分,与被监督对象狼狈为奸。更重要的是,“人盯人”所需人员众多,通过漫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发现问题,效率低下,运用于当今的反腐,很难有什么效果。

腐败是人性弱点与制度漏洞相结合的产物。反腐败,最重要的不仅是事后抓住已经腐败的官员,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堵住腐败的漏洞,从制度层面铲除腐败存在的土壤,这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权力过于集中,尤其是过于集中在一把手,民主集中制被一些人变成了一言堂,在监督缺位和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权力极容易被滥用。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联系过于密切,纠缠不清,缺乏透明性,很容易为权钱勾结的腐败交易造成可乘之机。

事实上,新形势下的反腐败过程,就是制度重建的过程。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内,价格双轨、经济特区、经济垄断等等,都为权力与利益的勾结创造了条件,无论从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反腐败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着手改革这些方面的制度设计,以最大限度地将权力与利益剥离。这个环节做好了,即使不“人盯人”,腐败行为也会大大减少。

退一步说,即使“人盯人”反腐,聘任10名干部监督“观察员”也只能视为作秀。常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干部问题看得最透彻、了解最多的是群众,如果多留心群众的举报,对它们反映的问题多加留心,发现线索及时调查,并将其结果公布于众,肯定会比聘任干部监督“观察员”更有效、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一些地方却一边拼命封堵群众的上访之路,一边设计监督人员,如此反讽,实在令人费解。